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研究: 基于经济长波理论视角

王 琳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全局背景和行动纲领。要深入理解这一新发展阶段, 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演变进行一个历史的、理论的以及现实的考察。为此, 文章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方法论, 构建了基于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分析框架, 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历程, 同时从经济长波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进行了理论阐释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经济长波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作者简介: 王琳, 经济学博士,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 F1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8) 04 - 0093 - 09

DOI:10.13658/j.cnki.sar.2018.04.011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全局背景和行动纲领。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的这一新发展阶段, 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阶段演变进行一个历史的、理论的以及现实的考察。

对于经济发展阶段问题, 经济长波理论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视角。所谓经济长波, 是指相对于古典经济周期而言更为长期的经济周期, 一般为期 50 - 60 年。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 至今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 可以将现有经济长波理论研究分为三大类: 一是技术创新长波论, 也即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长波主要动力的理论研究; 二是制度演进长波论, 也即更为强调制度对经济长波推动作用的研究; 三是内生机制长波论, 也即从经济运行的内部调节过程中寻找长波形成原因的相关研究。^①

近年来, 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将经济长波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 或对现有长波理论进行中国

① 马艳、王琳《三大经济长波理论比较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5 年第 3 期。

化发展,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周游、翟建辉将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得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创新高涨、潜在增长率下滑的阶段;^①马艳、王琳等对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进行了创新和中国化发展,通过对传统SSA理论基本概念进行调整,提出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CSSA)理论,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阶段演变进行了分析;^②许建康基于长波理论分析了以2008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并指出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关系是复杂巨系统及其高阶子系统与低阶子系统之间的复合关联,巨系统的剧烈震荡为中国增强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组织能力提供了机遇。^③

上述研究对于从经济长波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尤其是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中国化研究,目前已初具规模。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仍然沿着原有经济长波理论的惯有思路,也即或者单从技术视角、或者单从制度视角来分析中国经济的长周期问题,亦或仍然将经济长波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仅通过经济全球化过程作用于中国经济。这使得相关研究无法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逻辑。

本文旨在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方法论,构建基于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分析框架,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同时从经济长波视角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进行理论解读并提出系列对策建议。

二、基于“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理论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规律是推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转化的根本动力,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交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这一规律在每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某一具体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各种发展变化背后的支配性力量。也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相互适应和匹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基于这一方法论,我们将生产力具体为技术因素,将生产关系具体为制度因素,同时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考虑,继而建立“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分析框架。

(一)“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三要素及相互关系

第一元是技术力。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技术创新初期,出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家会纷纷引进新技术,加快资本积累,继而促进社会总价值的提高;而到了技术创新后期,新技术的普及使超额剩余价值消失,此时资本积累增长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减小。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技术创新对经济活动的效用或效力称为技术力。技术力的大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一是利益驱动,技术创新并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由利益所驱动,利益驱动的不同影响着技术力的增长速度和方向;二是知识基础,这一因素对技术力的大小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知识基础决定了技术力的上限,另一方面知识基础又是技术力发展的土壤,也即知识基础的突破性发展将推动技术创新呈蜂聚式发展;三是创新成果对科学知识的承载能力,新成果作为潜在的技术进步,其中所承载的技术含量以及创新程度的大小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技术力的大小;四是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力,要使创新成果对经济

① 周游、翟建辉《长波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周期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5期。

② 马艳、王琳、张沁悦《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与中国化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许建康《经济长波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活动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必须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是决定技术力大小的最终环节。技术力即是由上述四个关键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系统。

第二元是制度力。制度创新也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制度创新能够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也即通过设置或解除各种限制来影响资本积累的快慢,继而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制度创新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素质继而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即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提升劳动者创新剩余价值的能力。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制度创新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用或效力称为制度力。制度力同样有其动力源和各种影响因素。一是利益驱动,制度创新的主体(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微观主体)均为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因此利益驱动仍然是制度创新的原动力,决定着制度力的方向和变化速度;二是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每一项制度安排背后均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尽管新制度下的潜在利益集团具有制度创新的动力,但最终制度能否出台还要取决于潜在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这是决定制度力具体内容及方向的关键因素;三是制度的实施程度,一项制度创新得以出台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对经济活动产生较大的效用,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制度的实施,这是将理论的制度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关系的过程,决定了制度力的最终方向和大小。制度力即是由上述三个关键因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综合系统。

第三元是耦合力。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一方面,驱动技术力的潜在利益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决定技术力大小的承载能力和转化能力也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及其完善性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制度创新背后的利益追求及博弈结果的实现也离不开足够的技术力量支撑,对制度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实施能力也往往受到技术的重要影响。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对经济长期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若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契合度较高,则能够充分发挥并进一步促进技术力和制度力的作用,相反,则会抑制甚至不断削减两者的作用。为了厘清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提出耦合力的概念。所谓耦合力,即为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相适应、相耦合的程度,它决定了技术力与制度力所形成合力的大小,度量了两种作用力在作用方向上的契合性。

我们可以区分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三种相对状态,并以此为根据得到耦合力的三种变化状态。其一,当技术力和制度力的利益驱动相一致,并且制度的实施效果有助于技术创新和应用过程,技术的转化成果能够有效支持制度出台和实施时,两者处于适应状态,此时耦合力相对较强,且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其二,当技术力和制度力的利益驱动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制度的实施效果阻碍了技术创新和应用过程,技术的转化成果也不足以支撑制度出台和实施时,两者处于不适应状态,此时耦合力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其三,当技术力和制度力的利益驱动仍存在一定矛盾,但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或者出现较为集中的技术创新时,两者处于相对调整状态,此时耦合力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

(二) 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力,构成了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元分析框架

技术力衡量了技术因素对经济活动所起到的作用力,制度力描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起到的影响力,耦合力则表达了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相适应、相协调的程度。三者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合力,而正是这一合力真正决定着经济的长期波动情况。^①

首先,技术力与制度力的相对调整状态对应着经济长波的探索期。当前一个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同时,新的经济长波的探索期也逐渐开始了。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往往均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也即技术创新停滞、制度创新难以进行且两者之间的

① 张沁悦、马艳、王琳《基于技术与制度的经济长波理论与实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矛盾不断加强。当矛盾累积到一定临界状态时,便或者会推动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制度调整,或者会激发技术出现集群式创新,使得技术力与制度力进入相对调整状态。此时技术力或制度力将快速提高,且两者之间的耦合力也会从较低的水平不断上升。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耦合力的变化共同形成一个较大的上升推力,推动经济进入探索期,经济增长率也将随之不断提高。

其次,技术力与制度力的适应状态对应着经济长波的巩固期。随着探索期的不断推进,起初的大规模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将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表现为有步骤的制度创新、速度适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此时,技术力与制度力进入适应状态,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均对经济增长起到相对平稳的促进作用,三者形成的合力会推动经济进入巩固期,经济增长率也将随之进入平稳增长状态。

最后,技术力与制度力的不适应状态对应着经济长波的衰退期。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不论是技术力还是制度力均有着各种各样的阻碍力量,当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某一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力量,使两者无法实现同步提升。此时,技术力与制度力便逐渐转为不适应状态,具体表现为,或者技术力出现滞后,或者制度力出现滞后,或者两者之间发展走向出现冲突。技术力、制度力以及耦合力的不断下降形成一个较大的下降推力,推动经济进入衰退期,经济增长率也将随之转为不断下降。

可见,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三者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合力,而正是这一合力真正决定着经济的长期波动情况。由于在技术力与制度力共同作用于经济长波的过程中,发生着由相对调整—适应—不适应—相对调整的循环变化过程,经济也就一一对应呈现出探索期、巩固期、衰退期、新的探索期的周期性变化,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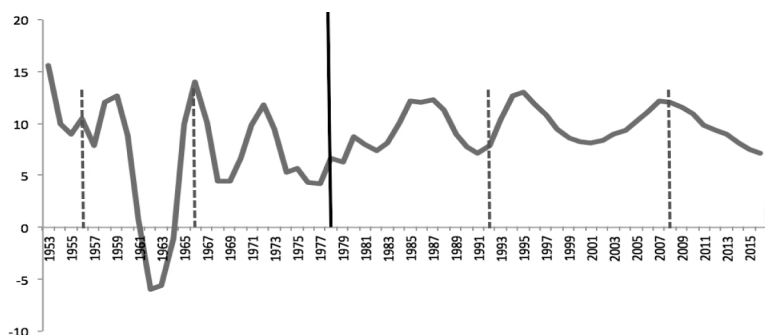
表 1 经济长波的阶段性特征

	阶段 A	阶段 B	阶段 C
经济长波	探索期	巩固期	衰退期
技术力与制度力相对状态	相对调整状态	适应状态	不适应状态
耦合力	上升	平稳	下降
技术力	上升/平稳	平稳	下降/平稳
制度力	平稳/上升	平稳	平稳/下降

三、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引起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力与制度力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合力的周期性变化。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这种合力的周期性变化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一是技术力需要一定的制度力作为保障,制度力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力作为支持;二是技术力与制度力在某一社会结构下终将受到一定的阻碍力量,继而形成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社会需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经济也存在着由技术力与制度力互动作用而引致的周期性波动,而不同的经济长周期也就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搜集整理了 1952—2016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增长率,并进行了 4 年移动平均处理,得到更为平滑的 GDP 增长率(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两个长周期波动,一是 1949—1978 年的计划经济长周期,二是 1978—2012 年的转型经济长周期,并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长周期波动阶段。下面,本文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长波周期,进行更为深入的阶段演进分析。

图1 1952—2016年GDP增长率四年移动平均^①

(一) 1978—1992年: 转型经济长周期的探索期

1949—1978年是我国计划经济长周期阶段,在这一长周期的后半段,计划经济制度已经显示出了对生产力发展的较强约束性,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这种矛盾累积到一个临界状态,正是这一矛盾推动了我国大规模制度创新的实施。1978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制度创新,使得技术力与制度力进入相对调整状态,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经济长周期的探索期。

从制度力的变化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核心思想是“权力下放”。企业制度方面,从“国家统负盈亏”转为实行“自主经营、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经济责任制;投资制度方面,下放投资的审批权限,将投资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的形式,并实行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等;金融制度方面,形成了以中央银行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新金融体系;科技制度方面,科研机构转为企业化经营,科研人员实行聘任制,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至1992年,我国经济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大大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有了进行技术进步的自主权和原动力,与此同时,金融制度改革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资金保障,科技制度改革则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知识基础保障。这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技术力有所提升,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也在不断提高。从数据来看,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速度的确有了明显的恢复。一方面,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从1986年的18509件上升至1992年的67135件,增长率达263%;另一方面,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也从1988年的72亿增加为1992年的141.6亿,增长了近2倍。^②

总的来说,1978—1992年期间,我国经济中技术力与制度力处于相对调整状态,这一状态由显著的制度创新作为主导,促使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不断提高,并同时促进了技术力的恢复。技术力、制度力以及耦合力的这种变化促使经济从衰退期转为新长波周期的探索期,这一分析也与图1中的GDP增长率变化情况相符合。

(二) 1992—2008年: 转型经济长周期的巩固期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改革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后我国的经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系2016年7月最新修订的GDP增长速度数据,该GDP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具体见网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7/t20160705_1373924.html。这里之所以排除了1949—1952年,是由于这三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国家统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很难找到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GDP数据;1961年和1962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是因为受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外部影响;1969—1975年间,虽然统计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但存在政治背景下统计数据造假的因素;1967、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以及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GDP增长率均为负数,这些数据相对更为真实。

②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济制度改革开始进入稳步推进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技术创新也取得显著提升,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之间相互适应,彼此加强,推进我国经济进入转型经济长周期的巩固期。

这一阶段我国的制度变化可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制度框架下,对前一阶段企业制度、财政制度、投资制度、金融制度等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企业制度方面,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财政制度方面,施行分税制改革,国家预算也从单式预算改为复式预算;投资制度方面,将投资项目区分为竞争性、基础性和公益性三类,并进一步完善投资项目管理体制;金融制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银行各级机构的职责,确定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推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机制逐步迈向规范化、法制化。

这一时期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投资制度等制度改革大大激发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投资热情,而金融制度创新则进一步为企业的创新和科研活动提供了更加多元和规范的融资渠道。也即此阶段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处于较高水平。

制度力与技术力的相互适应促进这一阶段我国的科技水平取得了极大的提高,在载人航天、核技术、信息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神州号载人航天飞船多次发射成功、超级杂交稻研制成功、研制出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机、人类基因工程方面获得多项突破等等。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一阶段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长来考察技术创新的增长情况。从图 2 中可以得到,这一阶段的技术创新不仅呈上升趋势,且增长率不断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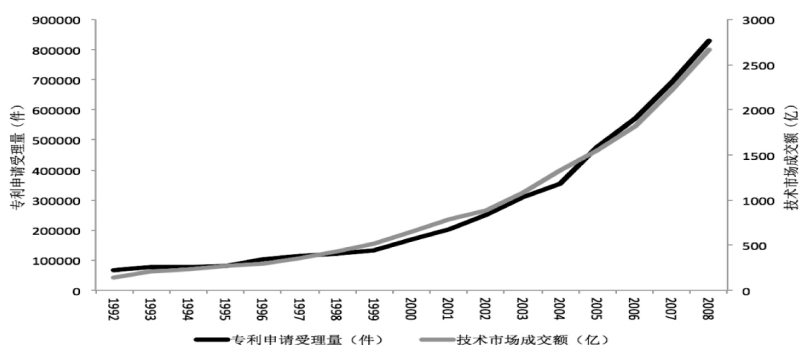


图 2 1993—2008 年间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①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1992—2008 年期间,我国经济中技术力与制度力处于适应状态。一方面,我国积极进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良,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成果奖励制度等,使得耦合力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较高的耦合程度反过来又促成了制度创新的稳定进行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提高。技术力、制度力以及耦合力三方面的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经济长周期的巩固期,呈现出长期、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这一分析也与图 1 中的 GDP 增长率变化情况相符合。^②

(三) 2008—2012 年: 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整体进入下行阶段,这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包括资源环境问题、房地产泡沫、收入不平等、产能过剩等诸多隐患和矛盾。这些矛盾的不断累积逐步成为我国技术力与制度力发展的约束和阻碍力量,推动我国经济进入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

① 数据来源: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② 我国在 2000—2004 年间经济有小幅的下降,这主要是受到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一方面 2008 年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占比不断提高,这使政府在制度设计、制度出台、制度实施等方面的难度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原有的“将市场机制不断引入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思路已经进入瓶颈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也对制度创新思路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即制度创新应进一步转向“以人为本”。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国际前沿技术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有不少重大技术项目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使技术引进方式所带来的技术力增长空间日益缩小,但同时国内自主创新制度仍不完备,自主创新能力仍相对较低,技术力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可见,2008 年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速度均有所减缓,且过去近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也累积了种种矛盾和隐患,我国经济中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也转为下降趋势。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三者的变化共同推动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阶段。这一分析与图 1 中的 GDP 增长率变化情况也高度吻合。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长波视角解析

基于“技术力-制度力-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理论,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进行深刻解读与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解析

根据前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分析可知,2008 年我国开始进入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阶段,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经济长周期正在酝酿而生。基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判断,2012 年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长周期。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制度力发生了重大转变。2012 年以来我国的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2012 年以来我国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常态”时期,通过一系列惠民举措,在解决贫困人口、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城乡就业、社会保障、健康医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二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五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三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生理与安全仅仅是人的低级需求,更高的需求应该是精神层面的,2012 年以来我国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中的“正能量”,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即,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不再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主线,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更多的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优越性为原则,这是制度创新结构上的重大转变。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技术力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2 年“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这一重大决策的引领下,我国近五年来技术创新也逐步从“技术引进、吸收”为主的模式向“自主创新”转变。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相继问世,均证明了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这即是说,2012 年以来,我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方向、原则、目标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转变,技术力与制度力进入相对调整状态,这一调整由制度创新为主导,制度力有较快提升,同时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也在不断上升,并推动技术力的恢复和提高。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前耦合力的共同作用,推动我国经济从转型经济长周期进入一个新的长周期阶

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对这一新的长周期阶段的科学阐释与总结。

首先,新的经济长周期是一个“新时代”。从转型经济长周期到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转变,由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体现为我国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方向、原则、目标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这对应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结构,一个“新时代”。

其次,新的经济长周期仍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2012年以来,尽管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均发生了诸多转变,但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同发展的基本分配制度,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并取得了经济建设、民主法治、人民生活、生态文明、强军兴军、大国外交等全方位的瞩目成就,十九大报告将之描述为“极不平凡的五年”。因此,新的经济长周期仍然坚持着“中国特色”这一发展道路。

最后,新的经济长周期强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性与优越性。以“人民为中心”是2012年以来我国制度创新转变的总体趋向,与此同时,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战略部署,“以人民为中心”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原则和逻辑主线。这意味着,以“强起来”为目标的新的经济长周期阶段,将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基础上着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优越性,也即遵循“以人为本”,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以上分析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重要论断,不仅符合经济长周期波动的理论逻辑,更是对2012年以来我国进入的新的经济长周期的科学诠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对策建议

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波周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必须认识到,当前仍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长周期的探索期,因此仍需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保持两者之间的适应性。为此,本文试图从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二者耦合力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技术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在保障技术力稳定提高的基础上保证技术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一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利益驱动转向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向,也即,对于那些关系到生态、健康、能源、资源等重大战略要素的技术创新,国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为相关技术的研发提供足够的利益驱动;二是政府要发挥基础作用,大力推进知识水平的发展,也即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基础研究在资金和科研人员方面的需求,有比例、有计划地推动整体科学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是政府要发挥协调作用,促进科学知识向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即应积极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国家科研机构与企业创新团队的合作和对接,及时扫清创新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障碍,为创新成果的研发提供充足的基础和条件;四是政府要发挥激励作用,支持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包括完善科研机构向生产企业技术转让的政策法规,通过税收或补贴手段对生产企业的技术引进提供优惠和支持政策,大力支持各类技术交易中介机构的兴办和发展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探索期应更好发挥制度力的作用,即在保证制度力稳定向前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创新向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向转化。具体而言:

一是要保证利益驱动的正向驱动。中央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时,其利益驱动具有较强的正向性。因此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应通过鼓励政策、惩罚制度等方式调整企业中负面的利益驱动;二是要调控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也即必须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决策权,避免某一利

益集团占据独断地位的情况;同时应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保障博弈结果的进步性;三是引导和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一般而言,中央政府作为权力机构具有较强的制度强制性,能够为制度有效实施提供更多保障,但地方政府和企业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往往更能刺激执行制度的积极性,如何将两方面的优势相融合是提高制度有效实施程度的关键。此外,决策传导机制是否有效率、监督机制是否合理也会影响制度创新的执行情况。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对技术力以及制度力的有效调控,促使两者之间的耦合因子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具体而言:

一方面,技术力的发展必须要依据制度力的现状,并为制度力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基于中国当前的制度情况,我们提出如下三方面技术创新的努力方向。一是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我国已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对能源问题的九个努力方向,但要更好地实现这些规划和改革,则必须要不断提高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为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基础条件;二是生态环保技术的创新。目前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逐渐影响了居民的健康状况、生活环境、农业发展等方方面面,加快生态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是当前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环保制度进一步创新的技术支撑;三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搜集和信息传递工作,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为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互联网空间的曝光机制能够显著提高政府对企业制度创新执行程度和质量的监督工作和惩罚力度,有利于保障制度创新的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制度力的发展也必须要基于现有的技术力,并为技术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当前全球变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与改善环境、节约资源相关的“绿色”技术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制度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保障和促进绿色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此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鼓励绿色技术的研发,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力度,通过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开展,政府还应适当将资本和人才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引导,保障绿色技术研发在资金和人才方面的需求;二是,政府应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例如通过建立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排污许可证等相关制度创新推动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引进和应用;三是,要想保障绿色技术的后续不断发展,政府必须要保持对经济活动较强的能动性,也即要坚持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建设,必须在保障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因子稳定发展的条件下,促使三者的发展方向转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只有在技术力与制度力稳定地相互协调、相互推进过程中,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 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 李祺、代法涛《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结构特征: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解释》,《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徐淑云)